

“我创造日月星辰 我驰骋风云雷雨”

——试论《女神》的崇高美

赵文祥

郭沫若早期诗作《女神》，以其的崇高宏伟、博大深邃震撼了一代青年的心灵。本文从诗歌艺术的美学角度探讨它的崇高美的表现技巧。具体分四个部分加以论述：①崇高美——《女神》的显著特征；②在奇特、巨大的艺术形象上表现崇高美；③千汇百合，融为一炉的崇高美；④《女神》崇高美的意境。值得指出的是，《女神》成功地创造了这样一种美学意境，它除了气势磅礴之外，还让人出神入化地体会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深厚内蕴。

“五四”时期，激荡的时代使青年郭沫若“象火山一样爆发了起来”^①。1921年8月，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女神》。《女神》犹如“横空出世”的“莽昆仑”，在中国新诗坛上建立了一座难以企及的奇峰，它以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显示了一种强烈、突出的崇高美。

崇高美——《女神》的显著特征

崇高是指自然界和艺术作品中能够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的一种美的形态。古希腊学者朗吉弩斯早已指出：“崇高风格到了紧要关头，像剑一样突然脱鞘而出、象闪电一样把新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它产生的效果是“狂喜”^②。柏克也曾说：崇高“用它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人卷着走，惊惧是崇高的最高效果。”^③我国古代的艺术家的各文论家对崇高美也有深刻的认识。在诗文中，文论家司空图在他的《二十四诗品》中，以“豪放”、“劲健”、“雄浑”等语来概括那种“天风浪浪，海山苍苍”；“大风卷水，壮士指剑”；“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的艺术风格。清代姚鼐进一步指出：“得出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如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④这里所谓阳刚之美的美感特征，和西方的所谓崇高美是相似的。

崇高美是《女神》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女神》收入包括序诗在内的57篇作品，表现了多样的风格。其中，收入第二辑的作品是《女神》中最有光彩、最有影响的作品，它们是《女神》的精华，《女神》的灵魂，它们没有“灰青”，没有“忧郁”，只有力！只有火！只有血！你听！一个勇猛咆啸的时代声音在叫：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天狗》

这是多么雄浑壮美的歌声，多么大胆热烈的破坏和创造的精神！在20世纪20年代苦闷的中国，这种充满叛逆反抗精神。力扫千军，气盖宇宙的诗句，恰如一座爆发了的火山，熔浆烈焰喷吐而出，光芒四射。诗中“我”的形象如巍然屹立的高山，有着压倒一切的气势；又如一团燃烧着的烈火，有着毁灭一切的力量，充分反映出诗人要冲决一切罗网、摧毁一切枷锁的自我解放的精神。

当时的中国青年，历经黑暗统治。精神世界长期被禁锢，使他们长久生活在“浓血污秽着的屠场”“群魔跳梁着的地狱”之中。他们苦闷、彷徨，面对着灰色死寂的宇宙黯然神伤。突然，天空中惊雷闪电，炸出了一条“狂飙突进”的“天狗”，它用自己山呼海啸般的声响，唱出了一代青年的希望、渴求、愤怒、苦闷和悲哀，并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向着个性解放的世界飞跑：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笔立山头展望》

这些诗句象喧嚣着的激荡的波浪，构成了“雄浑”、“劲健”的气势，为新时代奏起惊心动魄的赞歌，它预示着中国的明天，人类的明天。“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表现了一种前无古人、开创新世界的崇高美。

《女神》的崇高美，还表现在诗中所描绘的奇特而又巨大的艺术形象上。诗人往往描绘天地间最粗最大的形象，给人一种望而敬畏的崇高感。如《天狗》中，“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浴海》中“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以及《晨安》中的“晨安！我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呀！”“晨安！万里长城呀！……”这些巨大粗线条构成的形象，有着充实的内容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它不仅让我们“心情在自然界的崇高中感到自己受到激动”^⑥，而且，融汇着“自己的力量和人的尊严的自豪感”^⑦，浓烈、昂扬的爱国主义感情，显现了崇高美。读着这样的诗，催人奋发，更催我民族奋发！

康德曾把崇高分为两种：一种是“数学的崇高”，特点在于对象体积的巨大；另一种是“力学的崇高”，特点在于对象具有巨大的力量。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指出：“更大得多、更强得多，这就是崇高的显著特征。”^⑧“五四”时期最早的一批新诗人以自己或质朴或清新、或凄苦或天真的作品，给我国诗歌带来了春天的气息，但他们的诗面对着伟大的变革的时代，却显得太小、太实、太浅了，常常沉浸在一些小感奋、小悲哀之中。青年郭沫若以自己独特的性格，放眼世界，仰望苍穹，他惊叫道：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

——《凤凰涅槃》

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冷酷”“黑暗”“腥秽”的宇宙，象征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巨大而沉重的压迫。贫穷积弱连年军阀混战，弄得满目疮痍，饿殍遍地。精神枷锁的禁锢更让人感到窒息。强大的压迫，并没有使郭沫若屈服。在外来的西方思潮的冲击下，他对泛神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深受其影响。郭沫若承袭了唯物论者斯宾诺莎为代表的“神即自然的思想”。他曾说：“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⑧

在“泛神便是无神”的唯物主义思想影响下，郭沫若敢于蔑视千年封建神学加给人们的种种精神枷锁，发出了一毁灭旧世界的雷鸣般的吼声。同时，在“我即神”的拟人的精神为万物本源的唯心主义思想影响下，郭沫若把人的精神力量提高到了宇宙间的最高地位，并以此向一切腐朽的社会力量开战。他要立在地球边放号，看“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的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他“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暗”，要“血同海浪潮”“心同日火烧”；他庄严地宣告：“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

郭沫若把古今中外著名的社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先驱，说成是“匪徒——叛逆者，大唱叛逆者的颂歌，从而反衬出这些人物创造力量的伟大、精神世界的崇高。如《匪徒颂》中，将华盛顿称为“抗粮拒税”的“私行割据的草寇”；将列宁称为“实行共产主义”的“亘古的大盗”；将达尔文称为“毁宗谤祖”的“倡导人猿同祖的畜生”等等，最后，他狂热高呼：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匪徒们”“万岁！万岁！万岁！”显示了他同一切旧的宗法王道思想、旧的伦理道德彻底决裂的大无畏精神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郭沫若的《匪徒颂》，使一切反动统治者闻之丧魂落魄，表现了诗人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报纸诬蔑中国“五四”青年为“学匪”的谰言的无比愤怒和猛烈的反击，并深刻地讽刺了真正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伪善狡诈的反动统治者。《女神》中的“匪徒们”，是人类进步、文明的先进代表，也是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力量的集中体现，因而，这些“匪徒形象本身就是伟大，崇高的，具有崇高美。他们的伟大，也就是人民的伟大；他们的崇高，也就是人民的崇高。

应该指出，《女神》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运用奇特、巨大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崇高美，追根溯源，是因为郭沫若深受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雄浑、飘逸诗风的熏陶，和美国民主主义诗人惠特曼的豪放诗风的影响，加上“五四”时代精神的强烈冲击，才成为中国现代诗坛光辉灿烂的明星。

千汇百合，融为一炉的崇高美

崇高美的概念虽然源于西方，但中国古典诗歌并不乏崇高美。屈原的诗“逸响伟辞”神奇不凡，可谓“卓绝一世”。唐宋时期，李白的诗飘逸奔放，杜甫的诗雄浑苍劲，苏轼的词豪迈开朗，陆游的诗悲壮激昂。他们的作品都很有气魄，很有气势，体现了强烈的崇高美。

谈到中国古典诗词的崇高美，人们自然会想起李太白曾经描绘过的许多山崩海啸、斗转星移的雄伟壮阔的景象：“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其间充满了一种宏大的气势和力量，表现了作者对理想世界的热烈向往和对自身力量的歌颂。可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漫长的严酷的封建社会对我们民族情感的扼制，限制了我们古代诗人激情的迸发，所以，即使被称为具有崇高美的古代诗词中，总有一股抑郁之气、愤闷之气，李白不是也喊出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吗？

《女神》以其一往直前，义无反顾的精神，以崭新的、强大的独特风格，大大开阔了中国诗歌

的领域,提高了中国诗歌的格调,它表现了新的时代的力量。

《女神》的作品大多写在1919到1921的两年间,当时,正是中国新诗紧张探索的开创阶段。外国诗歌艺术涌进了中国诗坛。青年郭沫若就是在唐宋古典诗词熏陶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积极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的。他自己曾说过:“我的短短的做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泰戈尔式,这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段时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么把第二期的热情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⑩。他又说,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那时差不多是狂了。^⑪

《女神》气势磅礴、热情奔放的风格,正是受到惠特曼《草叶集》的浓厚、深刻的影响。《女神》中的主要作品,就是郭沫若在“五四”的高潮中写出的“惠特曼式”的作品。

惠特曼(1819——1892)是美国19世纪开始进入现代社会时第一个有创造精神的大诗人,一个代表着美国人民共同精神和性格的诗人。《草叶集》使他成为美国独立文化的战士,成为现代自由诗的先驱者。

惠特曼生活的岁月,正是近代美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他中年的时候,爆发了南北战争。这是新旧两种社会制度即自由劳动制度和奴隶制度之间的激烈斗争,最终以代表进步力量的北方获得了胜利。内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草叶集》对于这个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反映,它讴歌了民主自由理想和先进的社会力量,是时代的最强音。他曾把自己比作雄劲的苍鹰,自由而不可驯服,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地歌唱:

苍鹰在附近飞翔着,他斥责我,怪我不该饶舌和游荡。
我也一点没有被驯服,我也是不可解说的,
我在世界的屋脊上发出我的粗野的呼声。

——楚图南译《草叶集·自由之歌》

这“在世界的屋脊上发出”的“粗野呼声”,和郭沫若的在地球边上放号何其相似!在《斧头之歌》中,惠特曼从正面歌颂民主理想。他充满热情地塑造了一座“全世界最伟大的城池”,在这座城池里,“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的主人”,那里公民总是头脑和理想,总统、市长,州长只是“有报酬的雇用人”。诗人在《给一个遭到挫败的欧洲革命者》中宣称:“我是誓为全世界无畏的叛逆者进行歌唱的诗人。”他以始终一贯的嘹亮声音,以勇敢不屈的斗争精神来讴歌进步的社会理想。

如果说,彻底地否定奴隶制度是《草叶集》时代的基本特征,那么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则是《女神》时代的基本特征。《草叶集》是一首奏出了19世纪美国人民的心声,描绘出了“伟大的亚美利加形象、豪迈雄浑的交响乐章”;《女神》就好比是一首表现了“五四”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呼唤着从烈火中新生的祖国、奇丽壮美的交响乐章。它们的主旋律都是诗人站在本时代之前列,向新时代瞩目的社会理想。不同的是,《女神》的主旋律已经不仅仅是《草叶集》中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民主理想了。而是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结合的社会理想,它表现了一个新的时代中社会前进的动向,显示了更强大的生命力,更为崇高的美。

鲜明、突出的“自我”抒情形象,在《草叶集》和《女神》中比比皆是。如《自由之歌》中宣称:“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互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屯的儿子。”惠特曼“怀着不可

抗拒的意志”从束缚着他的旧观念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感到海阔天空,独往独来,雄视一切。《大路之歌》这样唱道:“东边和西边属于我自己,北边和南边也属于我自己。”然而,惠特曼的“自我”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代表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的共同经历,代表一个伟大民族的成长,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的进步力量的愿望。正如他在《自由之歌》中唱的一样:

无数年代有无尽的语言流露! 我的语言乃是现代人的一个字,“全体”。

《女神》,更大胆地表现了对于“自我”的态度。“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赞美我自己”,“崇拜我”,“我又是一个偶像破坏者”;“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我的我要爆了”。“我”是何等的羡慕工农,“想去跪在他(指老农)的面前……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在“五四”的诗坛上,如此大胆崇拜“自我”,又否定“自我”的诗人,只有郭沫若。

新的时代,形成了新的民族特征。《女神》中的自我,既是诗人本身,又不仅是诗人本身,他在《湘累》中这样表白:“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时代的斗士的形象,是“五四”时期要求与封建传统决裂,争取个性解放,争取民族新生的青年群象的个体表现。他吹响了时代的进军号角,他属于整个时代,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化身。这个“自我”是民族精神的“大我”、比起惠特曼的《草叶集》中的“自我”来,激情更饱满,形象更高大,崇高美的艺术效果显得更为强烈。《女神》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诗词和西方诗歌的崇高美,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以巨大的艺术形象的力量,独步中国现代诗坛。

《女神》崇高美的意境

《女神》不仅具有崇高美,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来看,它还创造了崇高美的意境。所谓意境,即意中之境,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①,是时代特征与个性特征的结晶体。

《女神》中,时代精神的崇高美和奇特、巨大的艺术形象血肉般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情景交融的崇高美的意境。读者读着《女神》的诗篇,尤其是读《女神》第二辑的诗篇,就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样一种境界:“高耸而下垂威胁着人的断岩,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在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荒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诸如此类的景象。”^②你将会为它奇特而巨大的形象,无边的天宇的背景和伟大的心胸所组成的画面折服,心灵受着强烈的震撼。正如朱光潜所说的那样:“第一步是惊,第二步是喜;第一步因物的伟大而有意无意地见出自己的渺小,第二步因物的伟大而有意无意地幻觉到自己的伟大。”^③你不能不因为读了《女神》而产生一种崇高的美感。

李泽厚在《论崇高与滑稽》一文中曾说:“崇高的根源产生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实践和斗争中,”他接着又说:“崇高正是在与各种严重的敌人,与困难、凶恶、灾祸、苦难、挫折的斗争中,才光芒四射的。”《女神》为什么如此有威力,如此崇高?原因就是伟大的“五四”时代精神造就了《女神》的崇高美,而独特、出色的艺术形象又使反映这一先进、奋发的时代精神产生了无比威力,在艺术上达到了一种较高的境界,形成了崇高美的意境。

诗的意境的创造,是抒情诗的目标和理想,也是一种特有的艺术典型形态。中国古老的美学思想认为,艺术意境是由主观的“情”与“理”(意)和客观的“形”与“神”(境)这两对美学范畴组合而成的。它们的关系,诚如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

求,心以理应。”是一种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关系。应当指出,对于诗来说,抒情是首要的。郭沫若曾鲜明地提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①“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②这就是郭沫若认为诗是诗人心中“诗意诗境”的自然流露的创作主张。郭沫若在给宗白华的信中曾说:“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这“宇宙万汇底印象”就是自然和社会的客观世界,客观世界是诗人心中诗意诗境的源泉,心境中的诗意都是客观世界在诗人心中的印象。

时代浪潮的激荡和先进思想的照耀。使诗人心中的“诗意诗境”随着时代斗争风云“翻波涌浪起来”,“生底颤动,灵底喊叫”^③便是社会客观的现实生活在诗人心中奔腾呼啸的回响。

当着“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远在日本求学的郭沫若,“念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使得郭沫若找到了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的喷发口,他的炽热的激情便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而巨大的艺术形象、奇特的想象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又为他提供了非凡的表现形式,“情”、“理”、“形”、“神”四者水乳交融,气势磅礴,让人出神入化地体会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就是郭沫若诗歌艺术风格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崇高美的意境。

《女神》的崇高美的意境的形成,标志着郭沫若前期的独特的创作见解、艺术风格的形成。朗吉弩斯曾经将崇高风格的五个方面归纳为:掌握伟大思想的能力;强烈的深厚的热情;修辞格的妥当运用;高尚的文辞;庄严的生动的布局。所有这些,《女神》都有很出色的表现。正因为如此,郭沫若能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大笔横空,以雄视千古的姿态,对新中国的建立作了科学的预言和充满热情的讴歌,振聋发聩,使一代青年猛然惊醒,魄动神飞。如果说,“崇高就是一个伟大心灵的回声!”那么,我们就能够说,《女神》是中华民族在一个伟大时代的民主和创造精神的回声!它的崇高美,不仅使中国现代诗坛增添了奇光异彩,而且,它还将在世界诗坛上流芳千古。

注 释:

① 《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第147页。

②③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112、243页。

④ 姚鼐:《复鲁絜非书》,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11页。

⑤⑫ 康德:《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7、101页。

⑥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页。

⑦ 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

⑧⑩⑪ 郭沫若:《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版,第182、209页。

⑨ 《沫若文集》第7卷,第68页。

⑩ 《序我的诗》,见《沫若文集》第13卷,第121页。

⑪ 北京大学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编,第38页。

⑫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243页。

⑬⑭ 《三叶集》,第46页。

(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煌)